

帝俄远东地区华人活动特点探析

——基于与当地朝鲜人、日本人的比较

潘晓伟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帝俄时代, 华人、朝鲜人、日本人是俄国远东地区外国劳动力的主力, 他们的到来一定程度弥补了远东经济发展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华人作为对当时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群体, 具有不同于当地朝鲜人、日本人的特点。华人数量多、分布广, 几乎所有的领域和行业都有他们的身影; 华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当时在远东地区的华人以男性青壮年为主, 女性很少; 华人融入俄国主流社会不理想, 赴远东的华人非以定居为目的, 长期居住者或定居者比例低, 生活圈子多局限于华人圈, 同俄国人接触少、交往有限。

[关键词] 华人; 活动特点; 俄国远东地区; 帝俄时代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22)03-0023-11

一、学术回顾

帝俄^①时代, 来自东亚邻国的华人^②、朝鲜人、日本人是俄国远东地区外国劳动力的主力, 尤其是前两者。他们的到来弥补了远东地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促进了俄国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三国劳动力中数量最多的是华人。华人在俄国远东地区的活动特点又不同于当地的朝鲜人、日本人。劳动力不足问题仍是制约当前俄罗斯远东地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引进毗邻国家的劳动力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途径, 因而研究远东经济发展史上的外国劳动力现实意义大, 然该问题未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关于帝俄时代远东经济发展中的外国劳动力的研究中, 国内学者仅将三者中某一方作为研究对象, 具体如下:

[收稿日期] 2021-12-12; **[修回日期]** 2022-02-21

[作者简介] 潘晓伟, 黑龙江富锦人, 历史学博士,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俄罗斯华人史和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

[基金项目] 本文是黑龙江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黑龙江大学专项项目“外国劳动力与帝俄远东地区开发——以来自中国、朝鲜、日本劳动力为中心的考察(2021-KYYWF-0141)”和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俄日关系中的朝鲜问题研究(1882-1910)(JC2020W3)”阶段性成果。

①帝俄, 即“帝制俄罗斯”或“俄罗斯帝国”。一般指的是 1721 年北方战争后至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前的俄罗斯, 具体指的是 1721—1917 年。

②关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华人的内涵, 国内著名的华侨华人问题专家周南京先生在《世界华侨华人词典》中将其归纳为: 对中国血统者的泛称; 又称外籍华人或华族, 英语为 Ethnic Chinese; 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原华侨及其后裔; 华侨丧失或放弃中国国籍, 并取得外国国籍后, 即改变身份为华人。周南京:《世界华侨华人词典》,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67 页。本书采用的是前者的范畴, 即帝俄时代俄国远东地区的华人泛指有中国血统者。从国籍上讲, 既包括加入俄籍或在俄国长期居留的华人, 也包括在俄国短期居住或暂时逗留的华人; 从民族属性讲, 既包括汉族人, 也包括满族人、蒙古族人等其他中华民族成员; 从职业上讲, 涵盖在俄国远东地区从事各类职业的华人, 如雇佣工人、企业主、小商贩、农民等; 从所从事活动讲, 包括各个领域的华人, 如种植、工商、采金、交通运输、渔猎采集等领域。本文同远东地区华人进行比较的对象——当地的朝鲜人、日本人的界定也是如此, 是以血统来界定。

(一)关于帝俄远东华人的研究

帝俄时代,俄国远东地区的外国人当中华人的数量是最多的,且活动最为丰富,几乎所有领域都有华人的身影,他们对远东经济发展影响也是最大的,故远东地区的华人受到国内学界关注。国内学者对帝俄远东华人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其一,从俄罗斯华人通史^①角度,展现了从19世纪中叶到当前俄罗斯华人200年左右的历史,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华人的特征,但侧重于宏大历史的叙述,对包括帝俄时代远东地区华人活动细节等挖掘不够。

其二,关于远东地区及全俄华人活动及帝俄政策方面的专著较少,以论文为主^②。这些成果对帝俄华人在远东种植、工商、采金、交通运输、渔猎采集等领域的活动进行全面研究,探讨华人在俄国远东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帝俄时代,在俄国从事的诸多活动中工商业是华人较为集中的一个领域,当时在俄国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华人比例较高,影响力也较大,各地华人协会的负责人多由商人担任,他们可谓是当时帝俄华人中的“精英阶层”。鉴于此,帝俄华商受到部分学者关注^③。然而,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华商问题的研究,国内学界对俄罗斯华商的研究较为薄弱。广西华侨历史学会主办的、在业界享有一定盛誉的华侨华人研究专业期刊——《八桂侨刊》非常关注海外华商问题的研究,设有“世界华商专题”栏目。近几年该期刊先后发表了多篇海外华商研究综述或各地区华商特点总结等方面的文章^④,涉及西欧、拉美、非洲、大洋洲等地区的华商,但尚未刊载关于俄罗斯华商的类似文章,这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国内学界对俄罗斯华商的研究现状。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关于帝俄华人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其一,以华人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时段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多,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性;其二,多集中于帝俄政府对华商的政策。这些研究成果对华人在远东地区的适应和与俄罗斯文化的融合以及自我管理等问题重视不够。

(二)关于帝俄远东地区朝鲜人的研究

同远东地区华人相比,国内学界对帝俄远东地区朝鲜人的研究略显薄弱,笔者目力所及,仅有少数几位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⑤。朴昌昱的文章大致勾画出朝鲜人迁移帝俄远东的过程。作者是中国朝鲜

①宁艳红:《旅俄华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赵俊亚:《旅俄华人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②关于俄国远东地区华人史,笔者出版(发表)的成果主要有:《俄国远东地区中国人活动史:1860—191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试论十月革命前俄国政府对远东华工的政策——以采金华工为例》,《世界民族》2020年第3期;《十月革命前俄国远东华人的种植活动》,《世界农业》2016年第6期;《十月革命前俄罗斯远东地区华人商业活动》,《西伯利亚研究》2017年第5期;《华人与19世纪末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市建设》,《八桂侨刊》2021年第2期。

③主要有:徐万民:《东帮华商在俄国远东》,《黑河学刊》1993年第2期;张宗海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华商在俄国远东地区的形成和发展》,《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2期;宁艳红:《浅析早期旅俄华商的经贸活动及其作用》,《西伯利亚研究》2014年第5期;谢倩、邵政达:《十月革命前俄国远东地区华人的国家认同差异及成因——以华商、华工和华农三大群体为研究对象》,《八桂侨刊》2021年第3期。

④主要有:张秋生:《拉丁美洲华商:历史、现状与展望》,《八桂侨刊》2019年第4期;张一听:《意大利华商群体的起源、发展与特征》,《八桂侨刊》2019年第4期;甘振军:《浅论当代非洲华商的现状、特点和机遇》,《八桂侨刊》2019年第2期;鞠长猛:《大洋洲岛国的早期华商及其历史影响探析》,《八桂侨刊》2019年第2期。

⑤主要有:南慧英:《俄国朝鲜移民政策研究(1860—19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黄定天、南慧英:《十月革命前俄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探析》,《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南慧英:《19世纪60—80年代俄国境内朝鲜移民法律地位形成的中朝因素探析》,《求是学刊》2012年第3期;南慧英:《十月革命前俄国远东的朝鲜移民人口状况研究》,《人口学刊》2013年第4期;陈秋杰:《十月革命前俄国远东朝鲜人的经济活动》,《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4期;陈秋杰:《十月革命前俄国远东朝鲜人的政治活动》,《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6期;陈秋杰:《十月革命前俄国远东朝鲜人的文化生活》,《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6期;朴昌昱:《1937年以前在俄国沿海州的朝鲜人》,《东疆学刊》2000年第3期;朴昌昱:《1937年以前在俄国沿海州的朝鲜人(二)》,《东疆学刊》2000年第4期;潘晓伟:《1884—1905年俄国对境内朝鲜人的政策》,《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5期;潘晓伟:《1863—1884年俄国对远东朝鲜人政策探析》,《北方文物》2011年第4期。

族居民,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是朝文资料,未能使用俄文资料。陈秋杰、南慧英和笔者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俄文资料。南慧英和笔者的研究主要从帝俄政策角度出发,陈秋杰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朝鲜人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活动进行的。

(三)关于帝俄远东地区日本人的研究

帝俄时代,远东地区日本人的数量明显少于华人和朝鲜人,且活动的地域较为狭窄,从事活动较为单一。与此相应的是,国内学界对远东日本人的研究明显弱于华人和朝鲜人。关于帝俄远东地区日本人的活动,仅有少数著述涉及日本人的渔业活动^①,这些成果主要在俄日或苏日关系框架下进行,是为阐述俄日或苏日关系服务,非专题研究。近期笔者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帝俄和苏俄政府对远东海域日本人渔业政策的文章^②,拙文仅谈的是帝俄和苏俄对日本人渔业活动的政策,未及其他。国内学界对日本人在渔业之外其他领域的活动缺乏专门的研究,仅在论述帝俄远东开发中外国劳动力时略及日本人^③。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尽管国内对帝俄远东地区华人、朝鲜人、日本人进行了一定研究,但鲜有将三者进行比较。笔者现不揣浅陋,在将三者进行比较基础上总结出华人不同于同为东亚人的朝鲜人、日本人的活动特点。

二、帝俄远东地区华人数量多、分布广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几乎所有行业和领域都有华人的身影,数量多。关于华人数量有不同的记载,而且有时差异会很大。尽管缺乏较为系统的统计,但有一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当时远东地区华人数量是外国人当中最多的。当时远东地区的外国人主要是华人、朝鲜人、日本人,其中华人的数量明显多于朝鲜人和日本人,以下几组数据可以证明。

南乌苏里地区是早期俄国远东地区华人、朝鲜人的主要聚集之地。1879年,南乌苏里地区华人和朝鲜人数量分别为:“蛮子”^④6802人^⑤,6802人仅为汉族人的数量,不包括其他民族的华人。若从民族来划分,当时远东地区的华人中汉族人比例最高,但非全部,还有其他民族的华人。同一年南乌苏里地区朝鲜人的数量为6152人,其中男性3374人,女性2778人,其中1284人接受了洗礼^⑥。1885年,乌苏里地区常住“蛮子”10353人,非常住“蛮子”4000人,合计14353人;同年乌苏里地区常住朝鲜人7029人,非常住朝鲜人1000人,合计8029人^⑦。不同资料显示远东地区华人、朝鲜人的数量不尽相同,另有关于20世纪初

①李凡:《日苏关系史(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勇慧:《俄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初祥:《国内战争时期苏俄远东与日本之间的渔业问题》,《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5期;钟建平:《浅谈十月革命前俄日渔业关系》,《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2期。

②潘晓伟:《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及俄国对其政策——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为例》,《世界民族》2021年第5期。

③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殷剑平:《远东早期开发中的外国劳工(上、下)》,《西伯利亚研究》1997年第4、6期;南慧英:《俄国远东移民群体结构及政策解析(1860—1917)》,《世界民族》2021年第3期。

④俄罗斯人所谓的“蛮子”(маньчзы)一般指的是在俄汉族人。至于这一称呼的由来,帝俄汉学家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认为是受中国影响的结果,蒙元时期蒙古人用“蛮子”来称呼汉族人。用“蛮子”作为对远东地区汉族人的称谓得到了与巴拉第同时代其他俄国人的认同,如纳达罗夫、普尔热瓦尔斯基,二人在著述中都以“蛮子”来称呼乌苏里地区的汉族人。还有部分俄罗斯学者认为“蛮子”称呼起源于19世纪中期以后的华工大量参与西伯利亚铁路建设时期,而非远东地区形成之初。

⑤[俄]伊凡·纳达罗夫:《〈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3页。该数字是前一年即1878年统计的,因而严格说是1878年的“蛮子”数量。——引者注。

⑥Сборник главнейших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ью, Т. IV. Вып. 2, Иркутск: типография Штаба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1884. ?С. 343.

⑦[俄]伊凡·纳达罗夫:《〈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6页。

远东地区华人、朝鲜人的统计数据(见表1)。

表1 1909—1911年阿穆尔沿岸总督辖区朝鲜移民和中国移民^①数量

(单位:人)

外国移民	1909年	1910年	1911年
朝鲜人	38 955	41 185	45 240
华人	88 168	83 393	80 045

资料来源:РГИА. Ф.1284. Оп.185. Д. 23. Л. 218. 转引自:南慧英:《俄国朝鲜移民政策研究(1860—19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9页

帝俄时代,俄国远东地区日本人数量远不及华人和朝鲜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人在远东地区主要的居住地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875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有日本人50人,1878年为80人,1880年为100人,1884年为412人(其中男性:126人,女性:286人)^②。除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捕鱼季在俄国远东的萨哈林、鄂霍次克、堪察加等沿海一带生活着一定数量的日本渔民。

以上数据和资料表明,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的记载来看,20世纪初阿穆尔河沿岸总督辖区及远东地区华人数量多于朝鲜人,也远超日本人。

当时华人分布之广、活动之多样是同时期远东地区其他国家的族群无法比拟的。从华人分布的区域看,主要集中在滨海省和阿穆尔省,且滨海省的数量多于阿穆尔省,所以滨海省的中、朝、日三国人的数量大体能够反映出整个远东地区三国人的对比情况。

1900年,滨海省的华人、朝鲜人、日本人数量分别为:31 448人、30 059人、2 282人^③。1906—1910年,滨海省的华人、朝鲜人、日本人的数量分别为:1906年:47 390人、34 390人、2 953人;1907年:64 891人、45 914人、3 080人;1908年:68 355人、45 497人、3 317人;1909年:65 409人、51 554人、4 047人;1910年:60 586人、50 965人、2 712人^④。

进入20世纪后,滨海省的华人和朝鲜人数量差距变小,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朝鲜人数量增幅较大。该情况的出现和朝鲜国内局势有关,进入20世纪尤其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加紧吞并朝鲜的步伐,朝鲜殖民地危机加深,中下层群众受剥削严重,选择移居邻国者增多,其中就包括俄国远东地区。

在滨海省之外,远东其他地区的外国人当中华人数量也远远超过朝鲜人。据《俄国皇家东方学会阿穆尔沿岸分会报告》显示,1910年,滨海省、阿穆尔省、萨哈林省、外贝加尔省朝鲜人数量分别是54 076人、6 000人、137人、84人,共计60 297人^⑤。

以上所列是远东地区或者阿穆尔河沿岸总督辖区范围内华人、朝鲜人、日本人数量的对比,华人数量多于朝鲜人和日本人的数量。除大范围比较外,可以从小范围内进行比较,以远东地区几个主要城市华人、朝鲜人、日本人数量为例。

①该处所言的“朝鲜移民”等同于笔者所称的“朝鲜人”。引文的作者在综合相关文件基础上对“朝鲜移民”界定为“出于各种目的迁移至俄国境内定居的朝鲜人及其后裔,包括入籍者和非入籍者两种类型”。参见南慧英:《俄国朝鲜移民政策研究(1860—19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但“中国移民”和“华人”不可以等同,因为绝大多数华人去俄国目的有别于朝鲜人,非定居为目的,所以表格中所言的“中国移民”代之以“华人”更合适些。

②П. Г. Васкевич, Очерк быта японцев в Приамурском крае.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Паров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афия газеты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1906г. С. 3-4.

③А. И. Петров,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 1856-1917. СПб: ООО «Береста», 2003. С. 111.

④П. Ф. Унтербергер,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1906-1910 гг. СПб.: тип. В. Ф. Киришбаума. «приложение 1», 1912. С. 2-3.

⑤参见南慧英:《俄国朝鲜移民政策研究(1860—19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02页。

1883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有华人3 019人、朝鲜人354人、日本人412人^①。19世纪90年代至1914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四座城市的华人、朝鲜人、日本人数对比在俄文资料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里以三者数量都较多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个年份进行比较。

1891、1901、1911年三个年份,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华人、朝鲜人、日本人数分别为:1891年:3 607人、842人、278人;1901年:6 200人、2 400人、2 300人;1911年:26 328人、8 445人、1 660人^②。

1891、1901、1911年三个年份,哈巴罗夫斯克的华人、朝鲜人、日本人数分别为:1891年:435人、70人、54人;1901年:1 510人、240人、300人;1911年:9 069人、765人、575人^③。

1898、1902、1909年三个年份,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的华人、朝鲜人、日本人数分别为:1898年:1 793人、585人、143人;1902年:3 971人、1 590人、457人;1909年:7 827人、2 353人、489人^④。

1891、1902、1911年三个年份,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华人、朝鲜人、日本人数分别为:1891年:104人、1人、25人;1902年:486人、73人、153人;1911年:1 074人、343人、403人^⑤。

另有资料显示,1896—1898年,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华人、朝鲜人数量和以上数字略有出入,但显示出华人的数量占有优势(见表2)。

表2 1896—1898年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华人、朝鲜人数量比较

年份	华人(人)	朝鲜人(人)
1896	1 205	107
1897	1 031	169(女性6人)
1898	950(女:8人,儿童:9人)	120(女:6人,儿童:3人)

资料来源:№ 53. Из донесения Николаевского полицмейстера военному губернатору Примо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о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корейцев. См.: РГИА ДВ. Корейцы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т. пол. XIX—нач XX в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зд-во Дальневост.ун-та, 2001. С. 111.

记载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华人的俄文资料较少,如记载以上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几个城市外国人数量的《滨海省概览》(Обзор Примо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中就未列布拉戈维申斯克华人的数量,在其他俄文资料中也仅为零星地记载那里中、朝、日三国人的数量。如1911年4月,布拉戈维申斯克有华人1 524人、朝鲜人383人、日本人279人^⑥。

除了主要城市外,20世纪初布列亚矿区和结雅两地也有数量不少的东亚人。1911年7月布列亚矿区的华人、朝鲜人、日本人数分别为:9 567人、1 558人、1人^⑦。1911年9月,结雅地区的华人、朝鲜人、日本人数分别为:163人、43人、58人^⑧。华人在布列亚矿区数量多,且同当地的朝鲜人、日本人数相比,占有

①А. И. Петров,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 1856—1917. СПб: ООО «Береста», 2003. С. 120.

②Е.И.Нестерова, Русская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и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на Юг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4. С. 361.

③④⑤Е. И. Нестерова, Русская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и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на Юг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XX вв). С. 362, С. 363, С. 364.

⑥№ 106. Сведения о числе корейских и японских подданных, проживающих в г.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е. См.: РГИА ДВ. Корейцы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вт. пол.XIX—нач XX в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111.

⑦№ 109. Сведения о числе проживающих в Буреинском горно-полицейском округе китайских, корейских и японских подданных. См.: РГИА ДВ. Корейцы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т. пол.XIX—нач XX в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46.

⑧№ 111. Сведения о числе китайцев, корейцев и японцев, проживающих в г. Зея—пристань. См.: РГИА ДВ. Корейцы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вт. пол.XIX—нач XX в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 250.

绝对数量优势,这在别处较少见到。这一结果出现是因为布列亚是矿区,有为数众多的金矿,吸引了大量华人到那里去采金。

从华人参与活动的领域看,在商业、种植业、采金业、渔猎采集业等领域从业者最多。同为东亚人的朝鲜人、日本人无论是数量还是活动范围都无法与华人相提并论。当时朝鲜人主要在农业、采金业、近海运输业领域里活动。一段时期里仅有采金业的朝鲜人的数量可与华人相当,但从 1908 年起俄国政府对雇佣朝鲜人进行了一些限制,远东地区金矿中朝鲜人数量下降。日本人活动范围主要在远东沿海一带,从就业领域看海洋捕捞业中占优势。此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等远东城市的商业、服务业也有一定数量的日本人。

整体上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日本人的数量远不能同华人相提并论,但单就海洋渔业尤其是远洋渔业领域而言,在该领域从业的日本人数量及影响力是超过华人的,以下表格能证明这点(见表 3)。

表 3 1910—1914 年俄国远东海域俄、日、朝、中渔业工人数量比较

(单位:人)

年份	俄国工人	日本工人	朝鲜工人	华工	年份	俄国工人	日本工人	朝鲜工人	华工
1910	7 110	8 593	938	—	1913	11 893	16 163	2 095	145
1911	8 700	10 635	79	—	1914	10 172	13 106	2 125	104
1912	12 300	14 338	33	—					

资料来源:Б.А. Гейнман, Рыбный промысел в водах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1910 г. Хабаровск, 1911, Вып. I. Приложение №16; Рыбные и пушные богатств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23, с. 313, 314.

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当时俄国远东海域作业的渔业工人中,日本人的数量最多,不仅远超中国和朝鲜渔业工人的数量,即使同俄国渔业工人数量相比也占优。19 世纪末 20 世纪俄国远东日本人对华人有数量优势仅限于海洋渔业领域,在其他领域华人数量及影响力要远远超过日本人。

从远东地区华人的籍贯上看,山东人的比例最高。这一情况的出现与近代山东省的生存环境有关。近代山东人口多、耕地面积少,且自然灾害频发,由于黄河改道的缘故,山东省是北方省份中水灾最为严重的省份。此外,旱灾、虫灾也时有发生。在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的背景下迫于生计外出寻找出路的山东人大多有人在,“闯关东”为首选。“山东之苦力,服役于其乡土者甚少,其多数皆赴满藏,或远赴南非洲、南洋群岛及北美洲。其分布势力之大,殊可惊异……彼等苦力,殊足发挥山东人之特性,其勤勉及忍耐力之强,有非吾人所能想象者。”“从山东省每年出佣满蒙俄领之苦力,大约 35 万人。”^①“闯关东”后继续“北进”或“东下”俄国远东地区的也大多有人在。

帝俄时代,进入俄国远东地区的山东籍华人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入境:一是从海路,当时芝罘^②是赴远东的主要出发地(见表 4)。芝罘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有航船通行,较为便捷的交通为山东人大量来远东地区提供了可能性。清政府驻符拉迪沃斯托克商务代表李家鳌与俄国远东地方官员的往来公文中称“大部分到阿穆尔河地区工作的华人来自芝罘”^③。无独有偶,作为 20 世纪初阿穆尔考察队成员,肩负考察“黄种人”任务的帝俄外交部特派员格拉韦(В. В. Граве)在考察报告中也写道:在我们边区的华人主要来自山东……芝罘是运送山东苦力到阿穆尔边区的主要港口^④。

①高劳:《山东之苦力》,《东方杂志》,第 15 卷,第 7 号。

②芝罘,烟台的旧称。

③РГИА ДВ. Ф. 1. Оп. 2. Д. 1268. Л. 8–15 об. См.: А. И. Петров,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 1856–1917. СПб.: ООО «Береста», 2003. С. 784.

④В. В. Граве,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Труды командированной по Высочайшему повелению Амур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 В. Ф. Киршбаума, 1912. Выпуск XI. С. 8.

表 4 1906—1910 年俄国驻芝罘领事馆为赴俄华人发放签证数量

(单位:份)

1906 年	54 883
1907 年	37 857
1908 年	22 642
1909 年	15 865
1910 年(截止到 9 月 1 日)	23 831
合计	155 078

资料来源:В. В. Граве,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Труды командированной по Высочайшему повелению Амур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 В. Ф. Киршбаума, 1912. Выпуск XI. С. 12.

上表显示, 1906—1910 年五年间共发放了 155 078 份签证, 其中数量最多的年份是 1906 年, 发放了 54 883 份签证, 最少的是 1909 年, 发放了 15 865 份签证。以上所列签证数量是发给通过正当渠道赴俄的华人, 除了合法途径外还存在非法入境者。关于这点, 当时清政府也是承认的, 为阻止华人经山东沿海港口非法入境俄国, 清政府曾照会俄国: “今青岛、威海等处赴俄华人, 既无中国官员护照, 所发船单几与运货无异……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 转饬海参崴官员, 嗣后如遇华人赴海参崴等处佣工, 若无中国官员所发护照, 不得进口, 是为至要。”^①

经非法渠道来到俄国远东地区的华人未在上述统计范围内, 至于这部分人的数量没有较为准确的数据, 仅能从某些记载中窥探出大概。1906—1910 年, 由芝罘经海路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华人数量为 197 879 人^②。比 1906—1910 年俄国驻芝罘领事馆发放签证数量多出 4 万多张, 其中部分是由芝罘非法入俄境的华人。当然, 无论是芝罘领事馆签证发放对象, 还是由芝罘登船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华人, 其籍贯不一定是山东, 但其中山东人会占有相当比例, 因而以上几组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俄国远东地区山东籍华人数量。由于从芝罘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华人数量多, 当时出现了多家负责运输业务的航运公司, 既有中国的航运公司, 也有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

第二条赴俄国远东地区的途径是陆路, 主要从中国东北地区进入远东地区, 至东北地区大范围“开禁”后, 更多的贫苦山东人流入东北, 其中部分人选择继续迁移入俄境, 即先“闯关东”, 然后由中国东北进入俄国远东地区。《胶澳志》记载: “鲁人之移植于东三省, 其职业以农为主, 而负贩于海参崴、哈尔滨各大城市, 或执一业以谋生者, 亦颇不解。远者或赴俄之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莫斯科。其初春去冬还, 固定之移殖尚少。”^③中东铁路通车后, 部分华人选择经铁路来远东地区。据俄国在华领事机构统计出 1906—1910 年华人从哈尔滨、宽城子出发经中东铁路赴远东的情况。1906 年, 哈尔滨向赴俄华人售出三等车票 10 008 张、四等车票 3 359 张; 1907 年, 三等车票 1 404 张、四等车票 587 张; 1908 年, 三等车票 663 张、四等车票 439 张; 1909 年, 三等车票 586 张、四等车票 1 816 张; 1910 年, 三等车票 437 张、四等车票 1 707 张。1906 年, 宽城子售出赴俄三等车票 21 张和四等车票 5 张; 1907 年分别为 94 张和 128 张; 1908 年分别为 159 张和 79 张; 1909 年分别为 7 张和 149 张; 1910 年分别为 140 张和 272 张^④。

①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四)》,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第 1800 页。

②Ф. В. Соловьёв, Китайское отходничество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эпоху капитализма (1861—1917 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9. С. 39.

③赵琦修, 袁荣等撰:《胶澳志》卷三,《民社志·移植》,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9 年版, 第 490 页。

④В. К. Арсеньев, Китайцы в 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 Очер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Москва: КРАФТ, 2004. С. 171.

三、帝俄远东地区华人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从停留时间上看,绝大多数华人在远东地区生活时间不长,多是季节性的,一般是春天来远东地区,选择一个适合的工作,进入冬天后一些人会选择回国,属于春去冬回的“候鸟”。还有一部分人会在秋收结束后继续留在远东地区寻觅冬天可以从事的工作,后者也不会一直在远东生活太久,一般生活2—3年,赚一些钱后就回国。按照“春去冬回”算,当时远东地区华人在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前提下,一年一般可以存150—300卢布,这收入是在中国国内收入的2—3倍^①。长期生活者有限,定居或入籍者更少。这一现象的结果便是导致远东地区华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多数关于华人数量的统计资料中,多会列出男性和女性的数量。1879年,南乌苏里地区共有“蛮子”6802人,其中男性6600人,女性228人^②。1883年3月13日符拉迪沃斯托克人口统计中未列出华人、朝鲜人、日本人的男女数量。在1897年帝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滨海省的华人数量为:男性28831人、女性453人^③。1900年,滨海省的华人数量为:男性30997人、女性451人^④。

据格拉韦统计,1910年8月,滨海省几个华人较为集中的城市男女数量情况为:符拉迪沃斯托克:男性28591人、女性1209人;哈巴罗夫斯克:男性7345人、女性127人;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男性5500人、女性2247人;尼古拉耶夫斯克:男性1896人、女性24人;伊曼县:男性1576人、女性31人^⑤。

同样据格拉韦统计,1910年8月,阿穆尔省几处华人聚集区的男女数量情况为:布拉戈维申斯克:男性4292人、女性43人;阿穆尔县:男性1870人,女性数量没有记载;结雅码头区:男性450人,女性数量未记载;阿穆尔哥萨克区:男性853人、女性1人^⑥。

帝俄末期远东各地华人男女比例悬殊的情况没有大变化。1916年1月,俄国官方资料显示,布拉戈维申斯克有华人男性4573人、女性37人;1915年初,萨哈林省有华人2876人,其中女性为37人,至5月女性增至76人^⑦;1915年8月,萨哈林有6010名中国男性,40名中国女性^⑧。

华人的男女比例高于远东地区朝鲜人的,也高于远东地区日本人的。1891—1901年,俄国远东主要城市日本男女数量情况上面表格中已经列出,比例不悬殊。1909年,远东几个主要城市统计部分资料显示日本男女数量为:符拉迪沃斯托克:男性1437人、女性808人;哈巴罗夫斯克:男性372人、女性462人;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男性252人、女性237人^⑨。

19世纪90年代至日俄战争是远东地区日本人快速增长时期,这时期俄国远东地区日本人数量及男女比例如下表5。

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领事馆的资料显示,1909年,日本人在远东地区主要城市的数量有别于滨海省统计的数据。哈巴罗夫斯克:440人(家庭数量:137户,男性:186人,女性:254人);符拉迪沃斯托克:1579人(家庭:312户,男性:843人,女性:736人);布拉戈维申斯克:312人(家庭:58户,男性:157人;女性:155人);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299人(家庭:65户,男性:137人,女性:162人)^⑩。

①A. Г. Ларин,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книга, 2009. С. 22.

②[俄]伊凡·纳达罗夫:《〈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3页。

③[俄]П. Ф. 翁特列格著,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滨海省:1856—1898年》,第281页。

④См.: А. И. Петров,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 1856—1917. СПб: ООО «Береста», 2003. С. 111.

⑤⑨ В. В. Граве,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С. 351, С. 203.

В. В. Граве,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С. 351.

⑥В. В. Граве,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приложение № 2”. С. 350.

⑦⑧РГИА ДВ.Ф.702.Оп.1. Д.1106. Л.23. 转引自[俄]达旗生·弗拉基米尔·戈里果利耶维奇:《20世纪上半叶在苏联的中国女性》,宁艳红主编:《旅俄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1页。

⑩转引自 В. В. Граве,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Приложение № 38”, С. 433—437.

表 5 1891—1901 年远东主要城市日本人数量

(单位:人)

地 点	1891 年		1892 年		1893 年		1894 年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1898 年		1899 年		1900 年		1901 年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241	274	399	269	568	388	474	382	686	598	803	619	890	717	732	938	1013	1172	1116	1110	1413	1485
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	13	68	16	70	43	99	22	68	73	116	76	119	112	136	123	156	127	219	114	215	195	235
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10	37	16	40	10	62	24	70	47	113	100	132	83	120	92	137	92	136	83	153	87	135
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	3	11	3	22	9	16	16	31	17	30	67	49	70	92	76	79	97	95	106	127	96	101
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	5	23	8	25	14	28	26	92	37	95	76	141	80	60	81	16	79	148	63	124	80	131
总计	272	413	442	426	641	593	562	643	860	952	1122	1060	1235	1125	1104	1326	1408	1770	1482	1729	1871	2087

资料来源:П. Г.Васкевич, Очерк быта японцев в Приамурском крае.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Паров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афия газеты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1906. “Таблица I”.

可以看出,无论是俄文资料,还是日文资料,都能反映出帝俄时代俄国远东地区日本人当中女性占有一定比例。除了居家外,一些日本女性也会出来工作,当时俄国远东地区的色情、家政服务等行业中不乏日本女性的身影。

帝俄时代,俄国远东地区华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出现既与华人来俄国远东地区的目的有关,也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安土重迁观念的因素有关,受此观念影响对加入他国国籍持谨慎甚至是排斥态度。

与当时华人在远东地区生活时间短和入籍率低相关的是,远东华人主要从事经济活动,较少参与文化活动、政治活动等。帝俄时代,远东地区华人较为集中的大城市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都出现过华人创办的以演出中国传统戏剧的戏园子,光临此地的多是华人。但这类场所的数量有限,仅仅局限于华人较为集中的、为数很少的几个大城市,不具有普遍性。至于华人在远东地区从事或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有待于新史料的发掘,帝俄时代远东华人的经济活动是华人活动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华人活动的全部。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华人来俄国远东地区的目的、生活时间长短及入籍率等都有关系。

四、帝俄远东地区华人融入俄国社会不理想

与在俄国停留时间短相对应的是远东地区华人融入俄国社会或对俄国文化认同情况不理想。当时帝俄时代远东地区的华人相对封闭,生活圈子多局限于华人圈,同俄国人接触少、交往有限。从语言的掌握角度看,精通俄语者少,皈依东正教和加入俄国国籍者更少。

对于远东地区华人固守本民族文化传统和融入俄国社会的情况,时人有过评价。俄国地理学家、曾任哈巴罗夫斯克博物馆馆长的阿尔谢尼耶夫(В. К. Арсеньев)评价道:指望华人俄罗斯化是不可能的,甚至说是幼稚的。众所周知,所有的“黄种人”在被欧洲人同化问题上都不顺利,这方面他们拥有某种抗拒力。我没有见过一个被俄罗斯化的华人,我见过信奉基督教的华人,但不是俄罗斯化的……不管在生活方式、习俗、着装,还是在习惯方面,中国基督徒都没有变化。任凭花多大力量,华人永远还是华人^①。时任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贡达基(Н. Л. Гондатти)持有和阿尔谢尼耶夫同样观点。华人坚持固有的文化传统,不放弃与祖国精神联系……丝毫没有同化于周围居民的想法,华人简直就是敌对分子^②。以上两人的观点有些夸大华人对俄国文化的排斥,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人融入俄国主流文化的情况。

①В. К. Арсеньев, Китайцы в 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 Очер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Москва: КРАФТ, 2004. С. 242-243.

②В. Л. Ларин, Китай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90-х: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1998. С. 154.

当时远东地区的华人加入俄国国籍者很少,出现这样结果既有华人自身的因素,也有俄国的因素。从华人的角度看,如不愿在俄长期居住,更不想入俄国国籍。从俄国角度看,俄国官方对加入俄国国籍者有一系列条件,如条件之一是皈依东正教。在此过程中,若娶了俄国女人为妻则会被优先考虑。华商叶华林 1895 年申请入籍被拒绝,理由是在中国有家室,后叶华林娶了一名俄国女性后如愿加入俄国籍。同样,还有名叫孙福的华人,皈依东正教后申请入籍未被接受,后来娶了一名俄国女性后得以入籍^①。

在加入俄国国籍问题上,华人与同时期进入远东地区的朝鲜人有差别。帝俄时代,远东地区的朝鲜人定居者比例较高,其中一些人为了更好地在俄国生活而选择加入俄国国籍,俄国政府也乐于接受定居的外国人。帝俄时代,远东地区朝鲜人入籍率较高。

1897 年,滨海省有朝鲜人 24 306 人,其中 11 211 人加入了俄国国籍,入籍率为 46.12%;1902 年,滨海省有朝鲜人 32 380 人,其中 16 140 人加入了俄国国籍,入籍率为 49.85%;1905 年,滨海省有朝鲜人 34 399 人,其中 15 122 人加入俄国国籍,入籍率 43.96%^②。1905 年后,入籍率虽下降,但仍保持在 30% 左右(见表 6)。

表 6 20 世纪初滨海省朝鲜人入俄籍的情况

(单位:人)

年份	入俄籍	未入俄籍	总数量	年份	入俄籍	未入俄籍	总数量
1906	16 965	17 434	34 399	1912	16 263	43 452	59 715
1909	14 799	36 755	51 554	1913	19 277	38 163	57 440
1910	17 080	36 996	54 076	1914	20 109	44 200	64 309
1911	17 476	39 813	57 289				

资料来源:С. Д. Аносов, Корейцы в 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 Хабаровск—Владивосток: Книжное дело, 1928. С. 27.

除了入俄籍率相差悬殊外,朝鲜人皈依东正教的比例也能反映出朝鲜人迁移俄国与华人的目的有差别(见表 7),因为皈依东正教是获得俄国国籍的条件之一,所以朝鲜人尤其是早期来到远东地区的朝鲜人皈依东正教率很高,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后进入一个理性阶段。

表 7 1883—1886、1888 年远东地区华人、朝鲜人皈依东正教之比较

(单位:人)

年份	华人		朝鲜人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883	—	—	109	93
1884	3	—	37	25
1885	3	—	288	271
1886	—	—	26	27
1888	3	—	128	89
总计	9	—	638	505

资料来源:А. И. Петров,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 1856—1917. СПб: ООО «Береста», 2003. С. 716.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皈依东正教的华人数量有限,而皈依东正教的朝鲜人远多于华人。华人、朝鲜人加入俄国国籍和皈依东正教的比例对比反映出二者来俄目的的差别,来俄国定居的朝鲜人大有人在,为了很好地生活多会选择入籍和皈依俄国主流宗教信仰,而绝大多数华人无此目的,故入俄籍和皈依东正教者

①Е.И.Нестерова.Китайцы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люди и судьбы, Диаспоры. 2003. № 2.

②Б. Д. Пак, Корейцы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ркутск: ИГПИ, 1994, С.74, 86.

甚少。1893年,远东知名华商纪凤台加入了俄国国籍。此前纪凤台曾申请入俄国籍,但俄国当局以“异教徒”为由拒绝,他在皈依东正教和剪掉辫子后得以入籍^①。

虽然早期远东地区的朝鲜人皈依东正教比例高,但朝鲜人对东正教不一定真正了解,仅是形式上的信徒,许多皈依东正教的朝鲜人仍继续信仰固有的宗教。后来随着俄国在远东外国人当中传播东正教力度的加大,如出版用朝文书写的东正教书籍、向朝鲜人村庄派遣传教士和建东正教堂等,皈依东正教的朝鲜人数量增加迅速,且朝鲜人也逐渐摆脱了最初的盲目皈依阶段,变为真诚地信奉,一些虔诚信徒还向教会捐钱建东正教堂。据统计,19世纪末远东的朝鲜人村庄中有大约10座教堂主要是依靠朝鲜人募集的资金建的^②。

帝俄时代,俄国远东地区华人融入俄国主流社会不理想的一个表现是,当地出现各类华人互助组织,如商会、华人协会、公议会等。这些社团的领导者都由成员自行选举产生,成员间一旦发生纠纷,按照习惯法在社团内部解决,一般不诉诸当地行政机关。

帝俄政府对来到远东地区数量较多的外国人——华人、朝鲜人的政策有区别。总体上看,对华人入境及在远东范围内活动的限制要较朝鲜人严格。这一差别的出现与华人、朝鲜人来远东的目的差异有很大关系,在来到远东地区的朝鲜人中以定居为目的大有人在。从该目的出发,朝鲜人会举家迁移,在远东的朝鲜人男女比例远不如华人悬殊。帝俄时代,多数华人不是以定居为目的前往的。赴俄国目的的差异在一些俄国人看来朝鲜人较华人安分,也较容易同化,于是对二者采取不同的政策。

(责任编辑:黄世棉)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ctivities in the Far East Region of Russia Imperial Era——Comparison with Koreans and Japanese in the Far East

Pan Xiaowei

(Heilongjiang Basin Civilization Research Center,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Abstract: During the Russia Imperial era, Chinese, Koreans and Japanese were the main foreign laborers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Their arrival partly mad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labour in the far East's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seas Chinese, who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ar East at that time,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Korean and Japanese. The Chinese are large in number and widely distributed. There were Chinese in almost all fields and industries. The ratio of male to female Chinese was seriously out of whack.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in the Far East at that time were young men, rarely women. The integ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to mainstream society in Russia was not ideal. Overseas Chinese did not go to the Far East with the intention of settling down with low percentage of long-term residents or settlers. For this purpos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Far East most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compatriots in the Far East with little contact with the Russians. They did not fit well into mainstream society in Russia.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Russian Far East; Russia Imperial Era

①А. И. Петров.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 1856 –1917. СПб:ООО«Береста», 2003. С. 400–401.

②А. И.Петров, Корей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60–9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ВО РАН, 2000г. С. 231.